

书话岁月

CHIFA——美洲的中国饮食文化标记

■金涛

【正是中国人餐饮业的兴起,也刺激了秘鲁农业结构的改变,秘鲁种植了多种多样的从中国引进的蔬菜,如荷兰豆、黄瓜、白菜、韭菜、芋头、大白菜、芽菜等。】

《舌尖上的中国》是一部深受好评的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纪录片。我一直想给摄制组提个建议:谈中国美食,发掘中国的饮食文化,不仅需要追根溯源,在中国乡土上寻找各种美食的发祥地(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视野还可以再扩大些,可以到周边国家,甚至世界各地去追踪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播,以及它对当地饮食的影响。

民以食为天,文化的传播交流是多层次的。中国饮食在海外的传播,首先会想到东京的“中国料理”,或旧金山唐人街的中餐馆,这都是很有名的中华饮食文化在海外的代表,背后都有一部深厚、生动的发展史。要谈及中国饮食文化传播,可不能漏掉远在南美洲的秘鲁。大洋彼岸这个遥远的曾经是印加帝国的文明古国,怎么会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30多年前——说起来,真有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况味——我去了一趟秘鲁,在首都利马以及特鲁希略、卡亚俄等地呆了些日子。后来在一篇文章提到:“秘鲁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但是由于华侨带来的东方文化的影响,外来的汉语已经渗透到西班牙语的词汇中,如中国饭馆称为中国“吃饭”,许多蔬菜和食品如葱、姜、白菜、蒜,甚至中国人食用的馄饨等,西班牙语的发音也完全同汉语一样……”当时我发现,在利马街头,尤其是唐人街,中国饭馆大招牌上都有醒目 CHIFA(读音即是广东话“食饭”)。由于时间匆忙,没去深入这一现象背后很多故事,只是知道秘鲁是美洲的中国移民最多的国家,几万中国劳工来到秘鲁的庄园,从事棉花、甘蔗种植,开采鸟粪作肥料,用汗水和生命发展了秘鲁的农业,也无意中中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传播到秘鲁城乡。这是一百多年前清末发生的事。

这一桩历史公案对我而言,已是逐渐消逝的如烟往事,不料世间真有无巧不成书的事。也许我与秘鲁有点缘吧,今年清明过后,我从故乡回到北京,有一

天又去逛农贸市场日书摊,居然遇到一本无人问津的宝贝。说它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这不是国内正式出版物,而是秘鲁大使馆印制的一本厚重的出版物,大16开,精装,264页,书名为《秘鲁中餐历史及食谱》,玛丽艾拉巴尔比著,秘鲁共和国驻华使馆翻译出版于2013年。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共35章。第二部分为食谱,共4章,一为“前辈们的食谱”,二为“秘鲁人最喜欢的一些中国食谱”,三是“利马市著名中餐馆的食谱”。最好玩的是第四章“中国驻秘鲁大使馆的食谱”,别开生面!

秘鲁驻华大使贡萨洛·古铁雷斯在书的序言中特别指出:“十分之一的秘鲁人有中国血统,而这恰恰是秘鲁是拉美国家中拥有最多中国文化体现的真实验证。”查有关资料,秘鲁人口数量为30946000人(2013年),十分之一就是一300万!他提到:“从大概一百年前至今,我们秘鲁人早已习惯了在我们丰富的美食中有熟悉的 Chifa(与‘棋法’音近)的味道。Chifa 这个被秘鲁人广泛使用的词,是指‘秘鲁中餐’,也引申到泛指所有供应这种菜品的餐厅。”(Chifa 这个词来自广东话或客家话“食饭”)。2012年,秘鲁人消费东方美食约10亿美元。)

作为一种文明传播现象,中国饮食文化在秘鲁盛行,与历史发生的文化交流不同。它不像丝绸之路因贸易通商导致的文化交流,也不是十字军东征随军事征讨产生的文明碰撞,而是通过我称之为层叠的方式,无意中促成了中国饮食文化落户美洲。

这个历史事件发生于19世纪中期,即1849年至1874年之间,约9万名中国劳工因饥荒穷困被迫离开故土(大部分来自广东农村),漂洋过海来到秘鲁。他们大部分在庄园从事农业,也有的从事铁路建设,开采鸟粪以及家务。中国苦力在严格管控下从事奴隶般的繁重劳动,没有人身自由,契约期通常8年。书中有一张珍贵的老照片——秘鲁北部甘蔗种植园的苦力,这个年迈的中国劳工满脸沧桑,衣衫褴褛,一只手提着一个瓦罐,可能是盛水或食物,另一只手拎着很像葫芦的容器。但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他套着脚镣,绳索挂在脖子上。在他身后是砍倒的收获的甘蔗,堆成小山。写到这里,我难以控制心中悲愤,这些中国苦力以他们汗水和生命振兴了秘鲁的农业,但他们过的是奴隶的生活,如同运到美国种棉花的黑奴!

几万中国劳工离乡背井来到秘鲁,许多人是受骗上了贼船,从此过着非人生活。在辛劳8年解除契约后侥幸活下来的,大多进入利马及沿海城市,也有进入安第斯山区或大森林。他们没有别的技能,不懂西班牙语,做生意没本钱,除了继续出卖劳动力,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从事新行业,即本小利薄的小饭馆。这种小饭馆非常简陋,价格低廉,经济实惠,加上食物别具风味,因而受到生活在底层的秘鲁大众青睐。对于远离故国的中国移民,在异国他乡的小饭馆里,品尝几种家乡菜,喝一杯苦酒,也是满足乡愁的一种排遣吧。

中国餐饮业兴起,刺激了秘鲁农业结构改变,秘鲁种植了多种多样从中国引进的蔬菜,如黄瓜、白菜、韭菜、芋头、大白菜、芽菜等。市场的需求激励了中国饮食不可缺乏的烹饪材料,如酱油(秘鲁人称 siyao,即粤语的“豉油”)和各种腌制食品,包括松花蛋、冬菇、腐乳、梅干菜及面粉、米粉的大量进口。时间以它的坚韧和耐性,开始改变秘鲁人的舌尖和味蕾,也改变了他们的审美观。很长时期,秘鲁人对中国饮食抱有偏见,20世纪20年代以后,利马人对中国烹饪的态度改变了,中国菜从不被信任,遭受蔑视的廉价食物,变成连富人都充满兴趣。同时,唐人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1921年末,一家杂志在报道首家中餐馆——广东餐馆开幕时这样写道:“他们在坚持不懈和勤劳的烹饪工艺中,成就了永恒的餐饮艺术。”20世纪30年代,去中餐馆用餐已成为时尚。秘鲁的一些美食家甚至说:“是中国人教会了我们如何科学又艺术地饮食。”

作者为此无比感慨地说:“中国美食在秘鲁的发展使得那些在150年前到来的中国移民继续延续他们的文化和习俗,从而形成一个强大的凝聚力。另外,在秘鲁,中餐馆从1920年以来使得秘鲁人和中国人建立了和谐的关系。多亏了他们,改变了秘鲁人之前对于亚洲人敌对和批判的目光。”

秘鲁曾经长期是西班牙的殖民地,通用语言是西班牙语,但西班牙的餐馆很少。作者指出:“这是一个独特的案例。中国移民用美食在秘鲁缓解了许许多多不可避免的坎坷。番茄虾仁、烤鸽子、炒米饭、馄饨汤在秘鲁的成功,比任何声称尊重其文化的讲话都更有效,也凸显了中国人对进步的渴望。”

这个见解是耐人寻味的。



科普演讲员之歌

■许木启

踏着早晨雨露,
迎着初升太阳,
迈上新的征程,
传播科学理想。

走遍大江南北,
来到高原边疆,
播下科普种子,
收获科学希望。

我们是光荣的科普演讲员,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我们是骄傲的科普传播者,
甘洒热血,奋发图强。

背起行囊,我们出发,
昂首阔步,歌声嘹亮,
向着目标永远前进,
我们走在科学普及的大道上。

注:作者是中科院动物所退休科研人员、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

近日,演讲团分赴西藏、青海和内蒙古开展科普教育,高原条件艰苦,但团员(不少人年龄超过70岁)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爱乐者说

1840年与柴可夫斯基

■李近朱

【那时,他们常不同城,或是相隔异国。于是,这近800封信,靠的就是邮寄了。】

对于爱乐者,柴可夫斯基是一位驾熟久矣的音乐大师。最近,我发现多年未曾注意的一个日期,即柴可夫斯基诞辰之日:1840年5月7日。这让我想到另一个日期:1840年5月6日。世界第一枚邮票——英国“黑便士”邮票,就在这一天面世。

也就是说,世界上出现邮票的第二天,这位音乐巨擘来到这个世界。不经意的两个日期相衔,似是没有更多话题的小趣味。殊不知,柴可夫斯基短短57岁的生涯,确与邮票系相有缘一大段时日。在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与创作中,有一件事在音乐历史上令人瞩目。一位叫作梅克夫人的富孀,出于对作曲家艺术才华的钦敬,在物质上给了柴可夫斯基长达14年的资助,以及尤为珍贵的精神上的与情感上的鼓励与温暖。在这个不长不短日子里,他们不曾谋面,靠的是通信往来的“两地书”。

1876年12月30日,梅克夫人在聆听柴可夫斯基管弦乐曲《暴风雨》之后,给作曲家写了第一封信,说出了“你的音乐确实使我的生活愉快而且舒适”的感端。当天,柴可夫斯基就回信了:“世间竟有像你似的少数人,如此忠诚和热烈地爱好着音乐,这真是一种安慰呢”。自此,整整14个春秋,他们之间的鱼雁传书大约有760余封。信中传递出了柴可夫斯基许多旷世名作的构思以及创作过程;如他创作著名的《第四交响曲》《第六(悲怆)交响曲》等作品的历程,皆记录在他们往来的书信中,已成为音

乐研究的珍贵资料。两位故交离世多年之后,梅克夫人的孙媳巴巴拉与美国入波纹,从留存于世的760余封信中遴选125余封,编辑了一部叙说柴可夫斯基生平与创作的著名的书,题作:《挚爱的友人》。1937年出版后,引起世人极大兴趣。1948年中译本出版,易名为《我的音乐生活》。

在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书信交往的14年中,人们惊异于他们的从未见面晤谈。但这却为后人带来一个幸运,就是留下的书信不啻为一段情感的与艺术的“史记”。信中可见,他们往往同日收信同日复信,他们可以一天写出与发出三封信,也可以一信寥寥数字,或用几个小时写出一封长长的信。那时,他们常不同城,或是相隔异国。于是,这近800封信,靠的就是邮寄了。

1857年12月22日,俄国发行了第一枚邮票。音乐大师与梅克夫人在邮票发行19年之后开始通信。这些信件当会通过邮局寄往寄递。我曾看过托尔斯泰生平与创作的实物展览,见到过与柴可夫斯基过从甚密的这位大作家的书信原迹,其中还有贴着邮票的实寄封。可见,在托尔斯泰与柴可夫斯基的那个时代,邮寄信件已是很普遍的事了。多年来,我保存着自1948年第一次出版以来的三个不同版本的《我的音乐生活》。这部书不知读过多少遍,但大多从音乐角度汲取信息与认知。最近,将“黑便士”邮票的诞生日与柴可夫斯基的诞辰日偶作关联,我又从邮政角度试寻这位音乐大师的“邮迹”。

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留有近800封之多信件,以信件完整保留来看,贴有邮票的信封,亦应有存。在我专注于柴可夫斯基贴有邮票的实寄信封时,发现了1893年的信封及信。但,这是他与梅克

夫人断绝联系三年之后寄给别人的信件。在这个信封上,邮票、邮戳、地址等作为邮递实寄的元素,均为齐全。因此,由此上溯几年或十几年,艺术大师与梅克夫人的通信不仅必用邮递,贴有邮票的实寄封的留存,亦应在情理之中。

最近多日,遍阅所藏关于柴可夫斯基的各种书籍与资料,以及网上信息。却只见书信原文字迹,未能发现实寄封的图样。看来,关于柴可夫斯基的那些著述与资料的编辑人,没有邮政的或集邮的观念,或将有关邮政价值的实寄封这个信息载体舍弃了。虽然那批书信连同实寄封原件是否完整留存存证未果,但可预想,如有这个完整留存,则是柴可夫斯基生平与创作的又一特殊佐证,也是当时俄国邮政运作的一个特殊存证。可惜,短时间里未必可以完成这个音乐的与邮政的探寻。期待再到俄罗斯,从这个新角度在柴可夫斯基的遗迹中再作考察。

1840年5月,相隔仅一天,就把这位音乐大师与邮票邮政联系起来。而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这14年的“精神往来”,或曰“柏拉图式”的爱情,这段被人称作“蓝色的爱”,在没有谋面没有相视之中,通达二人情感世界的唯一渠道,就是14年中邮递寄递的760余封信。

今日,我们解读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和那部书信体的《我的音乐生活》,过去知道的只是急急书写的信件本身,而从1840年5月相邻二日所引发出来的“邮”的视野,则将他们十四度春秋二人“信息”的传递方式活生生展现出来。这告诉我们,延宕至今的古老通信,让后人看到了音乐史上这段佳话与悲情,也为这座艺术与情感之桥平添了感人动情的辉煌。

飞沿走笔

【根据出土情况,在陵墓中还有大量的珍禽异兽,这些动物是带笼子葬在里面的,因为其中一头熊的脖子上还拴着铁链子。】

近日,美国《科学》杂志网站发布消息称,中英两国学者经过多年对比研究,发现了一种全新种类的长臂猿,遗憾的是这种长臂猿早已灭绝,长臂猿的遗骸是在中国陕西一座大约2200年前的秦国古墓中出土,其墓主人很可能是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

经过研究,这种全新种类的长臂猿被命名为“帝国君子长臂猿”,命名的根据是,晋代古籍《抱朴子》中“君子为猿为鹤”的记载,以及它可能出土自秦始皇祖母陵园的传奇经历,因此把这种长臂猿的属种定名为“君子属”“帝国种”。

新发现帝国君子长臂猿是一种新属新种不只是具有科学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可以获得文化上的比较意义。研究人员是经过与英国科学家合作,对古墓中出土的长臂猿遗骸进行3D建模,并标注了16个标志点,用好几年的时间将标志点和全世界现有的数百只长臂猿骨骼作对比,最终确认这只长臂猿不属于任何一种已知种类,是一种新发现的长臂猿。

由于环境变化和人为原因,这个新发现的长臂猿其实早就在过去的2000多年的演化进程中消失了,这既提醒今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尤其是今天长臂猿灭绝的速度很快,需要加强对还生存着的长臂猿进行保护,同时也揭示了一个科学研究上的必要进程,研究人类和生物的演化需要化石和基因的证据,并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如果这只长臂猿没有陪葬(准确地说更可能是殉葬),就不可能知道在历史的进程中还有一种后代的人们根本不知晓的长臂猿的存在。而且,如果没有这类动物化石,就不可能建立起人类和生物演化的科学线路图和演化轨迹,也就不能充分和深入认识人和生物来自哪里,走向何方,甚至不可能回答今天主宰地球的人类到底是神创还是生物演化的结果。

2004年7月初,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舒宾等人在北极的埃尔斯米尔岛发现一个兼具水生和陆生动物特点的化石鱼——提克(因纽特语“提塔利克鱼”的简称,意为大型淡水鱼),显示这种鱼介于鱼和陆生动物之间,是从水生动物到陆生动物的过渡状态。它长着肩膀、肘关节和腕关节,而且还有颌骨,由此证明生物演化是从水生到陆生,人从鱼演化而来。

然而,提克的化石如果不是在野外隐藏在3.75亿年前的远古溪流中形成岩石(化石),并且没有碰巧被研究人员发现,就无法获得化石证据,以证明动物到人的一个极为关键的演化节点。现在,从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的陵墓中出土了帝国君子长臂猿的遗骸,才让现代人知道,在中国的灵长类动物的演化史上还有一种已经消失的长臂猿,这似乎又得益于殉葬制度。

游走东邻

地震

■刘凌子

【开始时还会犹豫要不要出门避难,后来习惯了,连“朋友圈”都懒得发一条。】

日本是个地震多发的国家,这我在中学地理课本上就学过;日本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通俗点说亚欧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一挤压,日本就要地震。但是长期住在板块内部(北京)的我,生来一次都没体验过地震,更难以想象“地震多发”是什么场景。

刚到九州不久,学校就组织交换留学生们进行防灾训练。在地震体验区,我们几组轮流坐在四人桌椅上,模拟在客厅聊天时突发震度为7的地震时的场景。尽管在台上看大家一组组体验时感觉坐稳并没有什么难度,但我们组一上场我就被地震“抛”到了地上。台下工作人员和同学老师都替我着急,直喊“快钻桌下”,我却在那摇晃中难以移动,最终成了全班第一个“福冈大地震牺牲者”。其实严格意义上九州岛并不处于大地震带上,所以我在九州的一年并没有明显感觉到地震。我甚至产生了“地震多发也不过如此”的错觉。

来到东京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地震多发”,住在5层的公寓里隔三差五就要晃一晃。地震轻时以为是自己在抖脚,重时感觉像坐在地铁车厢中。开始时还会犹豫要不要出门避难,后来习惯了,连“朋友圈”都懒得发一条。同学为了检测是否地震发明了种种怪招,如“书架角上叠一摞硬币”“柜子里立一根铅笔”等等。来到日本,大家手机里都有一个软件叫作“防灾速报”,能够在地震发生的前几秒向住在震源附近的人免费推送地震警告。轻时只是推送屏幕消息,大地震时会强行发出地震震害速报音,提示将会发生地震。这本是一个救命的软件,但为了

根据出土情况,在陵墓中还有大量的珍禽异兽,这些动物是带笼子葬在里面的,因为其中一头熊的脖子上还拴着铁链子。而且在下葬前,这些动物可能是当作宠物养在杜南苑。这也说明,这些动物是殉葬而非陪葬,即把活着的人和动物陪同主人下葬,这有别于陪葬,后者是等人和动物自然死亡后与主人一起埋葬,主要是陪伴主人。

由此也体现了新发现帝国君子长臂猿的文化或文化比较意义,这就是再次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独有的殉葬和陪葬制度。中国殉葬制度最早始于商代,那时,人们相信人死后灵魂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墓葬是墓主在另一个世界的居所,所以一切都要按照“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礼制办理。

但是,殉葬的权力操之于奴隶主和贵族,因为他们才有权在死后让奴隶为之殉葬,以供其死后奴役驱使。所以,在本质上也就道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专制和残暴。到了秦朝,殉葬之风尤甚,迄今发现殉葬人数最多的是秦穆公,达到127人,陪葬的都是奴隶或者是俘虏。既然秦朝的皇帝、奴隶主和贵族都可以把人当作财产一样来活埋人殉葬,对于动物来说就更不在话下,把珍奇的长臂猿埋进陵墓,以陪伴主人也是顺理成章。

直到清朝康熙时期(1662—1722年),以人殉葬的制度才终止。王士禛的《池北偶谈》称,“八旗习俗,多以仆妾殉葬”,当时是户部侍郎朱裴上疏奏请禁止殉葬,“得旨允行”。这也意味着,迟至18世纪,皇帝权贵对仆人有生杀予夺权力的殉葬制度才得以废止。

比较起来,在人与人和人与物的相互关系上,尽管美国有黑奴制度,也没有出现殉葬,基督教统下的欧洲在人们的观念中,人死后都是要进天堂的,因而人与人是平等的,也不存在殉葬制。而且,在13世纪(1215年6月15日)英国国王约翰就被迫签署了有63条内容的《大宪章》,其中一条是,国王不得私自逮捕、监禁自由人,不得私自剥夺自由人的财产和政治权利,更不用说对其他人拥有生杀予夺的让其殉葬的权力。

因此,秦始皇祖母陵园发现新的动物物种——帝国君子长臂猿既有科学意义,更体现了文化的比较意义。

保证“速报性”,不经过人工判断机器自动发出,最近因为频频误报遭到很多日本人的不满,甚至在听到警报时也有很多人习以为常,懒得出门避难了。最近某次误报,由于茨城和富山两地同时发生小规模地震,被误算成了一场大地震,同时向多地居民推送了“大地震警报”。

其实也不怪最近“误报频出”,因为日本内阁府在2012年就发出预告说“近30年内有70%的概率会发生7级程度的首都圈直下型大地震”,而算来现在已经快过去10年,感觉地震的脚步一天比一天近了。有人拿出最近发生的地震统计图,发现震源地以环状向首都圈逼近,并且震级逐渐增加,说得头头是道,似乎即使是明天发生地震也不会意外。

我所在的学校有老师专门开设课程“灾害情报论”,给学生普及地震知识,还有一些研究室隔一两年就会拿出快要过期的应急食品分给学生,再去置换新的食品。我在租房时也受到前辈指导,要找建筑在台地上的房子,不能建在陡坡上的房子,否则地基不稳;要找建筑年数少的,因为地震相关的建筑法律在上世纪80年代和2000年经历了两次大修;要找楼房形状规整的,一层不要是车库等四面开门的结构等等,不知有多少科学依据,但这样的房子确实比起其他房子要相对贵一些。

百年来每每地震,总会引发各种流言,真假难辨,闹得人心惶惶。还有媒体学者就“灾害和流言”现象进行过专门的论述。然而在灾害真的临近时,我们也只能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担忧着莫不是下一个震的就是自家。这样想着,我也急忙拿出了塞在柜子深处的灾害应急包,跟风去超市抢购饮用水和应急食品,怕是真的大地震袭来,自己也失去了发“朋友圈”的闲心。

新长臂猿的科学和文化价值

■张田勤